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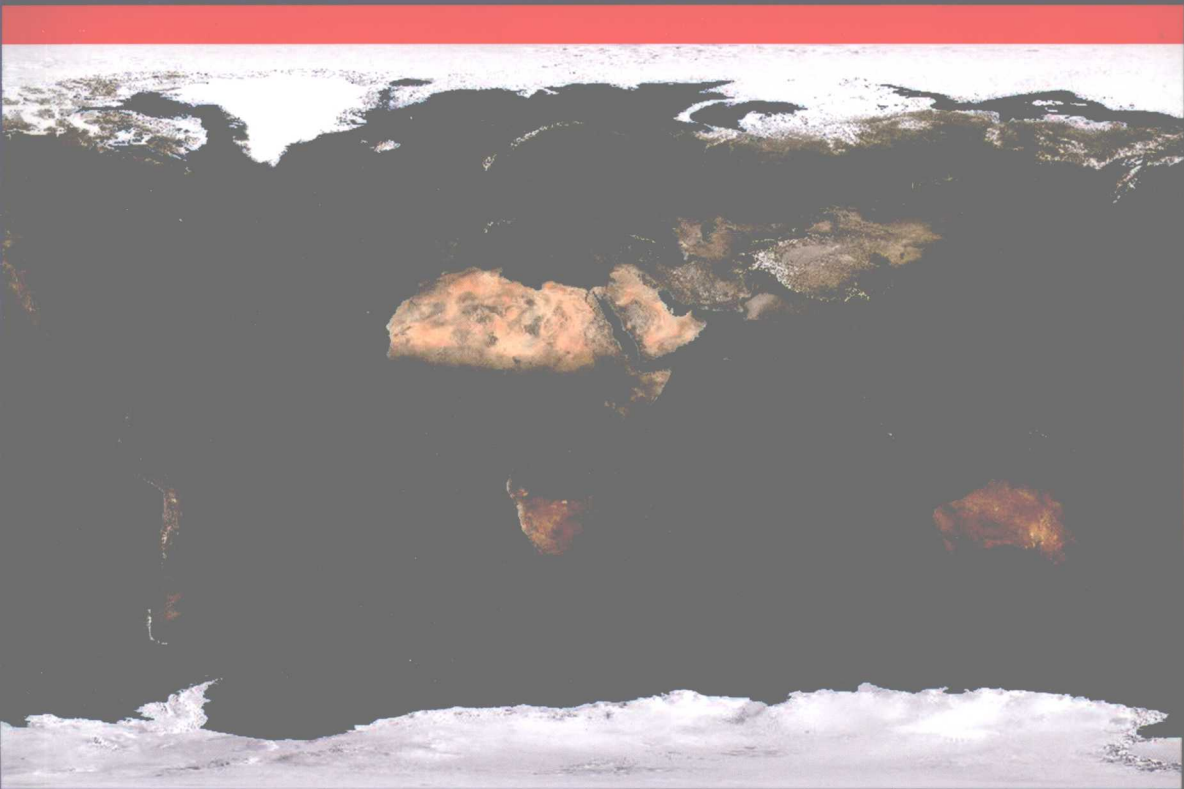
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澳大利亚与亚洲

[澳] 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 著

张勇先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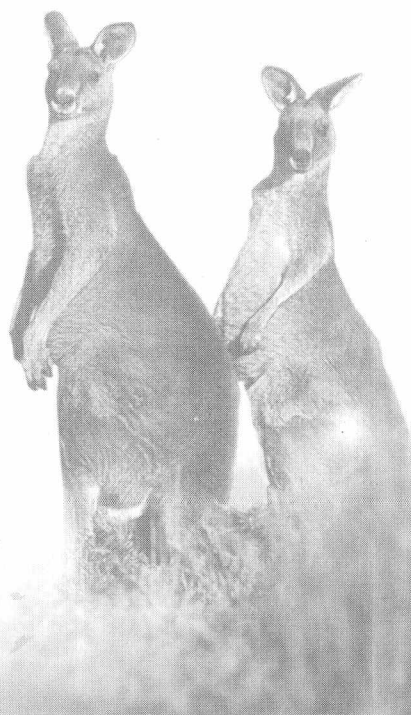


A 澳大利亚与亚洲

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澳] 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 著
张勇先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大利亚与亚洲 / [澳] 大卫·沃克著; 张勇先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00-10389-1

I. 澳…

II. ①沃…②张…

III. 国际关系史-澳大利亚、亚洲-1850-1939

IV. D861.19 D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647 号

澳大利亚与亚洲

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澳] 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 著

张勇先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 www. crup. com. cn](http://www.crup.com.cn)

[http:// www. ttrnet. com](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张 20.5 插页8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40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欣闻由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集体翻译的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历史学家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 教授的专著《澳大利亚与亚洲》(*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的中文译本即将付梓, 倍感激动。作为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会长,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有很大价值的事情。《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是一本介绍 1850 年至 1939 年间澳大利亚与亚洲, 尤其是东南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往来的专著, 既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性著作, 又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历史文化读物。该书曾经获得 2001 年的 Ernest Scott 最佳澳大利亚 / 新西兰历史著作奖 (the 2001 Ernest Scott prize for the best history of Australia or New Zealand), 这也是对本书的极大肯定。读本书, 既能增加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的了解, 同时, 作者幽默、风趣的文风引人入胜, 又能让人体会到澳大利亚英语文化的独特之处。

作者 David Walker 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 研究方向主要是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史, 他对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见解。我曾应张勇先教授邀请, 参加过几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澳大利亚文化周, 与 Walker 先生有过几面之缘, 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诙谐的语言和谦逊的性格让人十分难忘。最让人惊叹的是, 本书共 17 章二十多万字的内容引证丰富, 竟有多达 1 116 条脚注和近千本参考书目, 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及认真细致的学术态度, 都是值得国内学者和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同时, 读者更能体会到 Walker 教授典型的“澳式幽默”, 让你在字里行间忍俊不禁。

《澳大利亚与亚洲》学术性强、语言严谨、表达细腻, 而且带有独

特的澳大利亚语言文化色彩。因此，翻译此书的任务也就难上加难：澳大利亚英语有其自身特点，不易读懂，需要译者熟练掌握语言；翻译大量的幽默文字既要准确达意、忠实原文，又要使文章通顺，保持原文风格，也是需要费一番工夫的。本书的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集体完成，从译文来看，译者对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经济、历史、外交以及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英汉双语的功底都比较过硬。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澳中理事会（ACC）及各大学保持着广泛、频繁的双向人员交流。经过历时三年多的反复斟酌、修改和讨论，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才最终定稿，其间的艰辛和不易可谓不言而喻。

今年是中澳建交 37 周年，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两国间文化、学术交流发展迅速。看到《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的出版，我更期待有更多关于澳大利亚和中澳关系的著作、译作问世，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澳大利亚，促进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

杜学增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会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译者序

关于作者及本书简介

英文版《澳大利亚与亚洲》(*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于1999年由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和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联合出版发行。作者大卫·沃克(David Walker)。

大卫·沃克教授于1972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历史博士学位。他曾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史学院院长、美国乔治敦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教授,现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大卫·沃克1976年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梦幻与觉醒》。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文化历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的著述包括几十篇匿名评审的论文,共撰写、编辑出版了八部重要的有关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历史以及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著作。2001年他荣获墨尔本大学厄内斯特·司科特历史奖(该奖项是公认的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历史的最高原创著作奖)。同年,他被选举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随后又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

大卫·沃克教授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在亚洲国家(主要在中国、日本、印度)生活、工作和讲学。2004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下,他每年来北京进行至少为期四至六周的科研学术活动,每次都能高效完成预定的学术交流任务。大卫·沃克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交流频繁,参与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文化周”活动,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写作,为全校师生开办专题讲座。他还通过国际互联网为人大澳研中心的研究生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帮助。

2006年,大卫·沃克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续聘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

大卫·沃克教授举止文雅、幽默自然、待人宽容,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大家风度。在与他的密切交往中,人大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获益匪浅,同时,彼此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年,我经常听到的不仅是严肃的讨论,也有活泼的笑声。近年获“澳中理事会”(Australia China Council)资助,赴澳大利亚学习的硕士生在大卫·沃克家中一住就是几个月。跟学生一样,我深为这位澳大利亚友人及其家人的慷慨、宽容和耐心而感动。

2007年,陆克文(Kevin Rudd)就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之后,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澳大利亚科学研究理事会”(ARC),投入巨额资金推出了澳大利亚“全国科研竞争项目”(NCGP),支持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大卫·沃克教授的“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文化历史研究计划适逢其时,顺利赢得了该项目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在本书《澳大利亚与亚洲》(1850年—1939年)之后,他已完稿的第二本专著《澳大利亚与亚洲》(1945年—1972年)可以在2009年底顺利出版,根据大卫·沃克教授科研计划的进展安排,第三部著作《澳大利亚与亚洲》(1972年—)也会在不远的将来与读者见面。

英文专著《澳大利亚与亚洲》是澳大利亚政府项目的标志性研究成果。英文书名名为 *Anxious Nation* (副标题为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在把 *Anxious Nation* 这本专著的英译汉稿件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前,译者考虑再三的是如何确定中译本书名。在英语中,anxious 更抽象一点的表达就是充满“焦虑”、“疑虑”、“忧虑”,或带有某种“顾虑”兼有“恐惧”的意味。但若把原书名 *Anxious Nation* 译作“焦虑的国度”,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那样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原著所指的国家。因为,美国媒体近年也常把美国描写为一个“焦虑的国度”。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媒体常用 anxious 一词形容美国。2008年美国大选之后,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 11月8日的文章仍把即将处于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比作“焦虑的国度”。经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商, *Anxious Nation* 一书的中译本书名最终确定为《澳大利亚与亚洲》。(《澳大利亚与亚洲》包括的只是1850年至1939年期间的内容,而1939年至1972的内容和1972至今的内容将分别包括在即将出版的另外两部著作中。)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作者大卫·沃克教授治学严谨、观察敏锐、

知识面广、注重实证研究，是澳大利亚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学者的杰出代表。他犀利的文笔令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学者和英国学者对澳大利亚人刮目相看；其作品旁征博引，约十一万字的正文含有 1 096 条注释（近三万字）。撰写《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所参考的 1939 年之前出版的书籍达 208 部，1939 年之后出版的书籍 189 部，1939 年之前刊登出版的文章 178 篇，1939 年之后的文章 60 篇，各个时期的论文 13 篇，此外还参考了澳大利亚各地档案馆收藏的原始手稿 38 件，以及电影和电子数据库中保留的珍贵资料等。

本书为读者描绘了 1850 年—1939 年期间，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亚洲及澳大利亚人对亚洲人充满疑虑、恐惧甚至仇恨的焦虑心态。在书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到那一时期澳大利亚对日本、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认识和看法，而很多认识和看法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当时一部分以优越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自居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白人”比其他种族的人优越，而将亚洲各国的移民视为“种族入侵”。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不少人用“劣等”民族、“黄祸”（Yellow Peril）、“洪水”等类词语描述亚洲移民。这些文字流露着明显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的思想。在当时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眼中，中国人生存在一个低俗不堪和道德败坏的封闭世界里，整日勾心斗角，世俗圆滑，自私自利。借助《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今天的读者可以反观那段历史，剖析历史上虚构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亦译傅满楚医生）形象的塑造过程，体察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曾被污蔑为“黄祸”的那段屈辱历史。

在这里，本书译者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受时间、地点、语言特点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作者及其引述的某些观点有其局限性，不代表译者和出版者的立场，希望读者审慎辨别。

本书所涉及的两个敏感话题

讲述 19 世纪后半叶与 20 世纪前半叶的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必然要涉及关于种族问题的敏感话题，《澳大利亚与亚洲》也不例外，离不开“黄祸”和“白澳政策”这两个有关种族歧视的话题。

“黄祸论”

给后世留下不少名言的拿破仑（意大利语“荒野雄师”的意思，1769 年—1821 年）曾将中国比作“东方睡狮”，在某种程度上，他所

表达的也是对中国焦虑。早在 19 世纪初叶，欧洲的一些学者就将成吉思汗蒙古大军的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在鸦片战争之前，“黄祸”这个词语并没有对中国的形象造成多大危害。当时与“黄祸”对应的英文词汇主要是“黄色恐怖”(Yellow Terror)和“黄色危险”(Yellow Danger)等。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德文和英文的“黄祸”(Yellow Peril)一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 年—1941 年)的发明(1895 年 9 月)。其中的“黄色”指蒙古人种的肤色，而英文 peril 的本义是“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或威胁”，20 世纪，流传在欧美非主流媒体中的英文 Yellow Peril 一词常被用来指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

起源于 19 世纪后期的“黄祸论”最初主要针对中国。据考证，最初提出这一谬论的是俄国人巴古宁(1814 年—1876 年)。在 1873 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他认为中国的巨大人口“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中国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那些年，“黄祸论”在西方大为盛行，推波助澜者中不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外孙)在执政期间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1868 年—1918 年，威廉二世的表妹夫)曾沆瀣一气，就所谓的“黄祸”问题紧密联系、推波助澜(此二人均通英文，分别是德国和俄国的末代皇帝)。

1895 年，威廉二世将由他本人创意的一幅臭名昭著的油画《黄祸图》(德文: Die Gelbe Gefahr, 英文: The Yellow Peril)作为礼物赠送给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为此画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信仰和家园！”在这幅画正中，天使米迦勒(Michael, 亦译“迈克尔”)手持宝剑，召唤欧洲各国，警告即将来临的威胁；左上方背景是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右后方描绘的是一个像“佛”一样的人物，乘坐火龙冲着欧洲大地席卷而来，以此象征所谓的黄种异教徒对欧洲的入侵。这幅油画曾被制作成张贴画，在欧洲广泛流传。《黄祸图》在欧美国家几乎家喻户晓，使白种人对“黄祸”的恐惧几乎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与此同时，猖獗的“黄祸论”此起彼伏，甚嚣尘上。

在“黄祸论”的影响下，美国在 1882 年和 1884 年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直到 1967 年美国才宣布这种法律违反宪法。而澳大利亚于 1901 年出台的《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以及 1905 年的《移民限制补充法》一直延续到 1973 年才寿终正寝。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各主要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都有类似的“限制移民法案”, 这些法案均与“黄祸论”紧密相连。那时出国的华工大受排挤, 倍受侮辱。西方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华工愿意接受比欧洲工人更低的劳动报酬的憎恨, 还有对中国男性移民会与白种妇女结婚而繁衍后代的恐惧。

这些憎恨和恐惧甚至还成了当时很多欧美小说、戏剧、诗歌的主题。英国作家希尔 (M. P. Shiel) 于 1898 年出版了短篇系列故事《黄色危险》(Yellow Danger), 再版时, 书名改为《黄祸》(Yellow Peril)。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作家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1876 年—1916 年), 其有《马丁·伊登》、《野性的呼唤》、《海狼》、《白牙》等名著留于后世, 居然也为赚钱赢利写过名为《黄祸》的文章, 出版过污蔑中国人的小说《空前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空前的入侵》于 1904 年出版, 虚构了一个将在七十年后 (1976 年) 发生的、中国侵略、霸占世界而最终被彻底消灭的耸人听闻的荒诞故事。在美国, 宗教卫士卢珀特 (G.G. Rupert) 于 1911 年出版的《黄祸: 即东方与西方的对峙》也是一部“黄祸”题材的作品, 其危害程度更大于《空前的入侵》。而像中国人熟悉的马克·吐温 (1835 年—1910 年) 这样的文学大师竟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对“中国人”的非议之中。应该说, 那时的“黄祸”题材小说、诗歌、报刊文章、漫画以及广播小说市场巨大, 以营利为目的而创作的此类作品大行其道。这种情况不但英国、美国有, 德国、瑞典也有, 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在去世后得到“国葬”待遇的澳大利亚 19 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亨利·劳森 (Henry Lawson, 1867 年—1922 年) 也未能摆脱“黄祸论”阴霾的浸染, 这位最能代表“澳大利亚的真正声音”的“人民诗人”给后世留下了名为《可笑》的诗歌 (“To Be Amused”, 1906), 作者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他对中国移民的愤懑情绪和他对澳大利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以这样的诗句结束那令人哭笑不得的《可笑》: “为使这方土地干净纯洁, 为使这个国家力量强大, 请把世界上的白人全都召唤来!” 语言对精神的作用具有持久性, 这种至今阴魂未散的可笑“召唤”确实令人深思。

20 世纪中期的畅销小说《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03 年—1950 年) 于 1948 年完成的作品。该书出版于 1949

年，问世不久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作品中首次出现的“老大”（Big Brother）、“新语言”（Newspeak）和“冷战”（Cold War）等词汇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黄种人”（Yellow Men）和“蒙古人种的脸”（Mongolian faces）的出现对中国人来说却更是无法释然。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自然会很敏感，使人感到惊骇的是作者的想象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黄祸”的声音居然还在这位作家的脑海中回响，此情此景，令人忐忑不安、浮想联翩。

用艺术手法捏造的“黄祸”形象代表人物非“傅满洲博士”莫属。“傅满洲”是英国作家罗默（Sax Rohmer，1883年—1959年，亦译洛莫尔）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小说问世不久，代表“黄祸”形象的、虚构的“傅满洲博士”即被移植到电影、广播、报纸以及漫画等各种媒介中。从罗默的第一部小说《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年）的出版发行至今，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傅满洲博士”的形象在西方几乎妇孺皆知，成了“东方的邪恶天才罪犯”的同义词。

从1913年到1959年，罗默一共写过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要“反面人物”的《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归来》、《傅满洲的手》、《傅满洲的面具》、《傅满洲的踪迹》、《傅满洲的头脑》和《傅满洲的暴怒》等十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在西方大众文化中，“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 亦译为“傅满楚博士”或“傅满洲医生”）是“黄祸”的形象代表。罗默之所以将小说中的这个“邪恶”人物命名为“傅满洲”，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可能取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幼稚口号，因为“傅”与“扶”的同音，“清”与“Manchu”有紧密联系；第二，“傅满洲”的“傅”可能取自“太傅”的“傅”字之音，“太傅”的官衔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清朝，“太傅”是个荣誉官衔，正一品待遇，相当于殿阁大学士的地位，同时，“傅”姓又为汉族三十六大姓之一。而 Manchu 是个英文单词，意思是“满族人”，实际是清朝统治阶层的代名词。“Manchu”一词代表着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本土的那些所谓的“满大人”。此外，英文的 Doctor 既可理解为医生，也可理解为博士。因为在罗默小说中，“傅满洲”曾发明了“长生不老”药，同时又知识渊博、聪明绝顶，所以译为“医生”或“博士”都不为错。

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一书中，罗默是这样描述的：傅满洲“瘦高个儿，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他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

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袋，细长眼里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能将阴谋诡计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同时又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傅满洲博士”，一个“黄祸”的形象代表。

罗默的小说曾被翻译成十多种欧洲语言。自1929年起，好莱坞一共拍摄了14部关于傅满洲题材的电影，使得“傅满洲”的传播面更加广泛。最后一部《傅满洲的奸计》(*The Fiendish Plot of Dr. Fu Manchu*)于1980年问世。该片曾激起美国华人世界的强烈抗议。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非常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汕头大学李贵苍教授的《揭露“傅满洲”医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对罗默笔下的邪恶中国人的代表“傅满洲医生”曾作了详尽的剖析。值得推荐的还有田俊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文《表现他者——作为西方“黄祸论”化身的傅满洲博士》(2008年6月7日)。读者也可浏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术文摘内容：“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20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http://www.cass.net.cn>)，或参阅周宁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北京出版社)及其论文《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学网或四川大学哲学系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

虽然“黄祸”和“傅满洲博士”并非存在于西方主流文化之中，但时至今日，某些拾人牙慧者还是乐于把中国人跟那些陈词滥调扯在一起。在2003年的美国NBA篮球赛事的报道中，奥尼尔曾被冠以“傅”的称呼，而姚明则被称为“残忍的”的“蒙古人”；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媒体指责墨尔本市政府投巨资建成的现代雕塑(弯曲金属板块拼接而成的黄颜色抽象雕塑)，媒体在报道中给该雕塑取绰号为“黄祸”，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批评。英国BBC出品的情景戏剧《傻瓜和马》的第二部第5集虽没有污蔑片中中国餐馆主人的意思，但片名还是用了“黄祸”一词。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43年)说过：“如果你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那你永远也是个小孩。”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Santayana，1863年—1952年)也曾有言：“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是注定会重蹈覆辙的。”列宁也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名言留于后世。从古至今，中国人更是把“以史为镜”、“以古为鉴”看做是应该时刻牢记的座右铭。在《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中，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直面描述了那个年月“黄祸论”在澳大利亚的影响，

在书中，读者会了解到根深蒂固的“黄祸论”给中国人以及亚洲人造成的伤害。

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是研究澳大利亚历史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其主要目的在于限制亚洲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白澳政策”大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和澳大利亚于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澳大利亚颁布实施《澳大利亚公民法》，事实上宣告了“白澳政策”的终结。

19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殖民地，这期间，英国开始停止向澳大利亚遣送囚犯，而在澳大利亚沿海地区，面积达几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在这期间被有权有势的人无偿占有，种族问题和贫富差别使19世纪中后期的澳大利亚社会动荡不安，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武装抢劫组织——内德·凯利帮（Ned Kelly）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紧随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淘金热，人们在澳大利亚又发现了“新金山”。仅1852年一年，就有九万五千多名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来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淘金。澳大利亚“新金山”连续二十余年吸引着各种文化背景的淘金者。淘金者中最显眼的是来自亚洲的黄皮肤中国人，在“淘金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人被认为是会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危害的“劣等人”和“野蛮人”。“疾病”、“赌博”、“吸毒”、“嫖娼”、“狡诈”、“肮脏”等罪名成了“华人”的同义词，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也成了排斥华人、推行“白澳政策”的起因和借口。“白澳政策”虽然并非单独针对华人，但它的形成却与华人紧密相关，而那时的澳大利亚对日本和印度有不同的看法。今后澳大利亚如何看待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这其中不仅包括各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还包括澳大利亚社会对各国移民和大批留学生的接受程度。

1855年，维多利亚州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规定赴澳轮船每艘载重10吨限载一名中国人，而且入境还要交人头税。此后其他州相继效仿，还先后召开过三次反对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的大洋洲洲际会议，并将中国人入澳的船载量由10吨载1人增至500吨载1人。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前，各殖民地都实行过各种各样的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

加大实行“白澳政策”力度的鼓噪在1901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的英联邦会议有这样的记录：“为了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会议中提到的“低等人种”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华人。根据同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移民限制法》，澳大利亚移民部门制定了针对华人和亚洲有色人种的“语言测试”。规定要求，入境澳大利亚必须能听写一段50字的任何欧洲文字才有希望获得入境签证。1905年，该测试又改为“可用任何一种语言”。但本质上离不开“限制”。康有为当年申请去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证，在得知康有为懂英语而不懂西班牙语时，移民官员偏偏将一份西班牙语试卷摆在了康的面前。

当年的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白澳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亚洲到澳洲的距离较近，而这两个地域的人口比例悬殊。在人口拥挤的压力下，亚洲人口自然会流向地广人稀的澳洲。而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涌入会大幅度降低澳大利亚白人工人的工资标准，因此，澳大利亚白人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下降，最终，亚洲的黄种人会“吞没”欧洲裔白种人。后来，澳大利亚出现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一部分人关心的是澳大利亚是否应该继续效忠大英帝国和英国女王，而另一部分人的观点是澳大利亚应该远离英国、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这期间，“白澳政策”一直是双方论战的焦点。即使在目前，“白澳政策”这一概念仍然是讨论澳大利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严肃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它使人敏感想到的是华人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受到的敌视和不公正待遇。“白澳政策”带有很不光彩的背景。

我们现在看到，在当今的澳大利亚，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澳大利亚人声称具有双重民族背景。而《澳大利亚与亚洲》中记录的事实是：当时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种族间的通婚将会导致地球人素质下降，因此，文明就会遭到破坏，文明就会衰退、崩溃，人种就会退化甚至灭亡。然而，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即使在今天，“种族通婚”（miscegenation）是否会导致文明世界的衰败依然是无休止讨论的主题。我们不能不说，《澳大利亚与亚洲》具有现实意义，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过去，认识到了现在，同时对未来也具有借鉴作用。

本书所叙史实及作者观点

《澳大利亚与亚洲》所包含的历史阶段（1850年至1939年）是澳

大利亚“白澳政策”甚嚣尘上的年代，而作者没有倾注全力去愤怒声讨是由诸多原因所决定的。其中包括他的写作风格以及他出于对读者群的考虑和对当今世界的理解。虽然作者没有在控诉“种族主义”方面花费过多的笔墨，但经过仔细分析之后，读者会发现，作者对罄竹难书的“种族主义”偏见的调查和批判其实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作者以他的冷静风格启发读者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作者提供的大量事实依据面前，用不着连篇累牍的说教，读者自然会心知肚明。“让事实说话”正是这位澳大利亚学者的风格和大家风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曾这样讲：写历史“要尽可能地保存真实，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要去虚构”，“隐瞒假造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种史德。

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最为关注和担心的国家大事就是澳大利亚的亚洲化问题。当时的澳大利亚，从上到下，人人感觉岌岌可危，表现得十分焦虑。社会上充满了忧虑和担心。社会上最流行的话语包括：“觉醒的东方”、“崛起的东方”、“黄祸”、“不增加人口就等于自取灭亡”等。那时，很多澳大利亚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受到了威胁。澳大利亚的未来究竟属于欧洲人？属于亚洲人？还是属于土著人？这就是当时酝酿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大事。《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面对亚洲的复杂心态。

根据《澳大利亚与亚洲》作者的观点：“黄祸入侵威胁论”只是大英帝国用来控制澳大利亚的借口而已。作者像侦探一样，挖掘、展示、梳理、分析了19世纪澳大利亚对亚洲的看法：因为亚洲人口众多，储存着巨大的能量，所以亚洲就会吞并世界上人口稀少的地方。邪恶的东方智能正在耐心地密谋，企图控制世界，虚构人物“傅满洲博士”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那时，很多人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聪明，是“邪恶的天才”；但同时，中国人又被描写为疾病缠身、没有道德、讲迷信、没有规矩的人。

那么，为什么把中国人当作攻击的目标呢？作者披露了统治者给出的理由：因为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太多了，而且来得还很早。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昆士兰的大牧场主雇佣中国劳工的记录。后来在一些金矿，来自中国的人数仅次于英国的人数。统治者利用“黄祸”制造事端，进而威胁、恐吓那些在殖民统治下的不驯服的欧洲民众的惯用伎俩显而易见。

中国人被妖魔化，但是澳大利亚对其他亚洲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作者认为，当时，印度被认为将要成为大英帝国的忠实成员，所以那时的澳大利亚人对印度比较友好。早在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前期，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就已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对印度友善的另一个原因，是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印度曾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食物、服装和畜产品的源泉。此外，还有澳大利亚高层人物对印度的认识的原因。比如，卡洛琳·契森姆（Caroline Chisholm, 1808年—1877年）这位曾经帮助了一万多妇女和儿童，被后人尊为“圣人”的女性，在澳大利亚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她在印度居住了六年之后定居澳大利亚，她对印度的好感也影响了一大批人。早年的澳大利亚总理迪肯也把印度看做是在文化、宗教和经济方面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的国家。

提起卡洛琳·契森姆在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贡献，中国人自然会想到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年—1920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尽管他在中国的表现曾引起轰动：为英国提供了关于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争斗的信息，目睹了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疯狂抢劫；做过袁世凯的顾问；还以中方“技术顾问”的身份，参加了1919年“凡尔赛和谈”工作。他对中国的感情，也许无所谓，也许无能为力。但无论如何，莫理循和卡洛琳·契森姆的影响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中国不仅和印度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有天壤之别。日本被看做是东方的英国，社会井然有序，有良好的政府治理国家，讲礼貌，讲文明，似乎一切都可以与英国相媲美。而日本女性也比中国女性有文化，有规矩，有修养。当日本海军小舰队抵达悉尼进行训练时，受到的欢迎和赞誉让美国海军官兵产生了不满和嫉妒。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好感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海空军1941年突袭珍珠港之前）。

《澳大利亚与亚洲》记录的是客观历史事实。作者在书中指出，在1850年—1939年这九十年间，在担心亚洲、害怕亚洲的同时，也有不少澳大利亚的名人志士，包括澳大利亚联邦的奠基人等，都看到了澳大利亚与亚洲潜在的密不可分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些人有信心、有远见，看问题比较客观，少有偏见。他们认为，文明进步和经济繁荣的亚洲将会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提出要了解亚洲，承认澳大利亚存在于亚太地区这一事实。通过回放潜心挖掘出的历史上各方面的声音和各色人种的心态，《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作者向我们传

达了澳大利亚对亚洲看法的各种信息。

尽管那个时期在澳大利亚发生的某些事情令现代人难以接受，尽管当时的一些观念和言论令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回顾那段历史，汲取当年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是绝对有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以史为鉴”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是全人类在文明进步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人类共同向前发展的基础。作者对澳大利亚是有信心的，对澳大利亚和亚洲关系的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澳大利亚具有英国的传统，之后受美国影响较大，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更接近亚洲，那么，澳大利亚的前途和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今天的亚洲已经不再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亚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要与亚洲交流合作。合作和交流的前提是如何认识亚洲、如何了解亚洲，而要了解亚洲就必须了解亚洲历史、“以史为鉴”。《澳大利亚与亚洲》不仅对澳大利亚人反思过去有意义，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也同样有意义。

对于《澳大利亚与亚洲》这本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格里菲斯教授认为，《澳大利亚与亚洲》是从政治和文学两方面入手，对血缘、热度、太阳、神经、性行为 and 梦幻等观念和疑团的探索。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和平静的雄辩语言对极度恐惧心态和神经质幻想进行了冷静的评判。作者从历史资料、科学技术以及文学作品诸方面入手，讲述了澳大利亚直面亚洲的多视角情景，其中有真实也有假设。对当今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提供的深层次话题，如人口、环境、多元文化以及占据澳大利亚是否合法等问题仍有其现实意义。《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的出版，还引来了阿德雷得大学政治学系安东尼·伯克博士《担心安全：澳大利亚对入侵的焦虑》（Pluto Press, 2001 年）一书问世。或许，“对入侵的焦虑”是澳大利亚长久以来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译者感言

《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的数据翔实，语言风趣。就语言表达而言，《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作者又与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国史概要》的作者）属于同一个类型。他们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以凝练的笔法和生动的行文，旁征博引，将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并娓娓道来，其可读性令读